

# 春节将至，聆听血脉相亲的牵挂

## ——《两岸家书》故事三则

沈文锋 陶 璐



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，明清以来福建居民大规模迁居台湾，两岸往来甚为频繁，留存了大量不同形式的档案文献，家书就是其中尤为珍贵的一种。因属民间自然往来，又是写给至亲的问候，家书往往内容质朴、情感真挚，最能透露写信人的真实生活和心境，反映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事实。

在2025年台湾光复80周年之际，我们策划出版了《两岸家书》，在一封封炽热动人的信件中，见证跨越海峡不断的亲情。中国人最讲团圆，春节将至，在此分享其中三则故事，一起聆听血脉相亲的牵挂和呼唤。

### “沧桑变后”，不变的骨肉情和拳拳心

“承示舍妹逝世，安仁东窗，竟叹离分。披阅之下，曷胜哀悼。”1910年，台湾最后一位进士汪春源在江西写下这句家书时，心情无比复杂。他的妹妹汪攀多年前嫁给一个台湾彰化的贡生。汪春源对妹妹的事很上心，曾写信给妹夫，谦称妹妹“赋性笨拙”，自己“功其时顺惟是”，关爱之情、惻惻之心溢于笔端。然而，汪春源此前竟不知他如此疼爱、挂念的妹妹已经去世，如今只能远远哀悼。这实在是因为，两岸亲人未通音信久矣。“自沧桑变后，琐尾流离，未尝一通音问，罪也何如！去岁接奉手书，临风流涕，藉慰十数年渴念之忱。”汪春源笔下的“沧桑变”，说的是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签署，台湾及澎湖列岛被迫割让日本。当时，正在北京准备参加会试的汪春源痛心疾首，与罗秀惠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，

发出“与其生为降虏，不如死为义民”的呐喊，史称“五人上书”。然而，泣吁呼号终究无用，台湾旋即沦陷。汪春源耻为“倭奴”，毅然举家内渡，他寄籍福建漳州，但始终未忘台湾。1898年他参加戊戌科会试时，仍书其籍贯为“福建台南府安平县”。

辛亥革命之后，汪春源归隐福建乡城，入鼓浪屿岩庄吟社。一批台湾内渡文人集结于此，“抗日复台”正是他们吟咏的重要主题。1923年，汪春源病逝。其墓碑对联虽有缺损，仍可见“孤岛”等字样，亦可见台湾故土光复，是汪春源萦绕心怀却无缘见证的夙愿。

### “国比家大，有国才有家”

2019年，林为民在电视节目中诵读了一封跨越时空的回信：“父亲，当年您带着国家未能统一的遗憾牺牲；后来，母亲又带着家未能团圆的遗憾离世。如今国泰民安，国家统一是两岸共同的心声……”

林为民的父亲林正亨，是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一员。在残酷的缅甸战场上，林正亨与日军展开肉搏，身负16处重伤，做了两次大手术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双手却落下残疾。直到1945年10月，右手才能勉强执笔作书，他立刻写信给一别九年的母亲：“台湾的收复，父亲平生的遗志可算达到了，要是有人知，一定大笑于九泉。”

“父亲的遗志”，指的是1904年林正亨父亲林祖密借奔丧之机，举家内渡来到鼓浪屿，于1913年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注销日本籍，同年11月取得中国国籍，是日据时期台湾民众正式恢复中国国籍第一人。“国比家大，有国才有家”，林家家训如文化基因流淌在林正亨的血脉中，让他跟父辈一样，在国家蒙难之时，毅然选择忠贞报国。后来，林正亨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组织安排下，回到台湾开展秘密工作。1949年8月18日，林正亨被捕，在狱中

受尽酷刑，但始终坚贞不屈，尽自己所能，保护中共地下党组织。

他给母亲留下充满亲情和家国情的诀别信：“我想到父亲的壮志……我须担起重重的责任，所以我踏上父亲的道路……‘苦难与牺牲’，这是崇高的品性和无比的光荣。所以妈你不用不着悲伤，也不用为我担忧，生着要为责任艰苦牺牲奋斗，死是我们完（成）了责任！”一个家族的爱国之情，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国之志，猎猎回响。

### 共圆寻亲梦，割舍不断的血脉

2023年5月，梁栢植一行从台湾彰化元中村出发，来到福建南安翔云镇，与同辈宗亲梁振权紧紧相拥。站在祖宅前，看着古厝及周围环境，梁栢植由衷感慨，“这里是我们的根，我们回家了！”

梁栢植的先祖因生活困苦，在清乾隆年间翻山越岭来到福建建瓯，再搭船渡海“十去六死三留一”的黑水台，在台湾鹿港上岸，又走了很久，到达今天的元中村，在那里落地生根、开枝散叶。到如今，已过去230余年沧桑岁月。这次寻根之旅，历经32年终于得以实现。

1990年，梁栢植收到了一封家书，第一句就是“栢植亲人你好”。来信人梁昆清，偶然从《梁氏族谱》中对比查证，确认自己与梁栢植有亲属关系，同属“玉养”世系。于是他提笔写下：“从高祖父到现在已是二百多年，世世都思念嗷传，每逢五月十五玉养公祀（祭）神日都想念在台的亲人。而今得知情况，确是故乡亲，甚欢喜。”

梁昆清热情邀请梁氏宗亲回乡谒祖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梁栢植没有回信，但一直保存着这封家书。直到2022年，他主持修订《梁氏族谱》，通过台湾博物馆馆长施明发，向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时任馆长陈伟平求助，希望能补全两岸族谱世系。



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供图

林正亨在狱中写给儿子的家书。

《两岸家书》：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著，沈文锋主编；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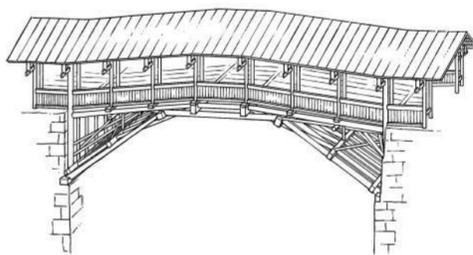
“跨海之托，不可辜负。”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通过分析、比对馆藏的《象山梁氏家谱》，深入梁氏家族聚居地实地考察，整理出了梁氏家族的完整脉络。这一发现，使两岸的《梁氏族谱》接合成了上下连贯的谱系，也再次证明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、血浓于水的历史渊源。而故事的主角梁栢植，把这次返乡之旅称为“种子行动”，意在播下寻根会亲的种子，鼓励迁台后辈都能回故乡走走看看。

《两岸家书》收录了22个家书故事，主人公身份经历各异，书信内容也各不相同，但有一样是不变的，那就是跨越海峡的牵挂。这份牵挂，是两岸同胞最真挚的情感，是两岸一家亲的有力见证，是不论分离多久都不能割舍的血脉。

（作者分别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副馆长、《两岸家书》责任编辑）

## 桥里有智慧，桥上有故事

刘 妍



木拱桥桥插画。

中信出版社供图

说到中国古桥，我们心中的美学意象，往往是颐和园十七孔桥的“金光穿洞”，是“卢沟晓月”数不清的石狮，是江南雾气中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。这几年，来自南方偏僻山林的桥梁形象，开始收获更多关注——廊桥与木拱桥，人们常常把它们搞混，而其交集木拱廊桥，可以说是中国古建筑中最具趣味的品类之一。它们都是《传奇与绝技：木拱桥里的中国营造智慧》（中信出版社出版）书写的对象。

廊桥，顾名思义，桥上有廊。廊桥多见于南方的山林，桥上盖屋，保护着风雨行路的旅人，也保护着木造的桥身。廊屋的遮护，确立了一个空间；空间，就意味着故事的诞生。于是，廊桥从通道转变为行人的歇脚地，继而汇集商販，聚起神明，从道路节点拓展为乡人的聚合点。

木拱桥的定义，则在于廊下桥梁的结构形式。它是拱桥，却以木造，将平直的材料幻化为长虹。中国人发明了一种“编木成拱”的技艺，大木纵横交织，如经纬线般

相互咬合，得以用较短的木料实现较大的跨度，这就是木拱桥。其最高超的本领在于，使用最简单的材料与工具，在悬崖深涧架设飞虹。在闽浙山区近5个世纪的传承中，只有寥寥数个匠人家族掌握这种绝技。

写这本书，我怀有一个强烈的小心愿：通过偏僻的桥梁门类，重塑中国古建筑在公共书写中的样貌。中国建筑不仅拥有庄严的宫殿、恢弘的庙宇、繁复的斗拱、精美的壁画——以厚重的历史和高妙的技法

载入史书的艺术品，民间的营造智慧也应占有相应的篇幅。

我曾测绘过百余座木拱桥，三度参与桥梁建造。这次，我愿做一位讲故事的人，一位魔术揭秘的解密者，将读者带入建造的现场，潜入匠人的头脑，去体会真实的营造挑战与技艺关窍。比如桥匠在遭遇工程事故的情况下，如何以寥寥四根巨柱为脚手架，搭建半成的构架作为后续平台完成建造，几乎没有多余消耗。这种原理，恰恰就是营造里的中国智慧。

西方廊桥的技术发展，以德语区与美国先后为继、最为成熟，体现着结构技术的工程探索；而中国廊桥的空间浪漫则举世无双，它的功用可以是交通、驿站、庙宇、商铺，甚至会与戏台，几乎囊括乡村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中西之间的相互映照，使我们得以跳出庐山之外，更深刻地辨认中国文化特质中那些细致入微的肌理。

说到底，建筑，不仅是凝固的技艺，还是凝聚的故事。

## 县城是我的一个朋友

### ——长篇小说《剧院》创作谈

海 飞

收到样书的时候，我开始想念那座住在我身体里多年的县城。我常常觉得，县城是我年轻时的一个朋友。1992年，我退伍回到浙江诸暨，从火车站下车，看到了右侧的西施商场，听到了张学友和叶倩文轮番上场的歌声，年轻人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服装，留着郭富城发型，我几乎是在一瞬间，像一滴水融进大海一样，融进了县城。

我在化肥厂拉过煤，在夜市摆过摊，在报社写过稿。那时候我很快乐，虽然钱不多，但够去小乐园喝一碗冰镇绿豆汤，够买一张三块钱的海浪歌舞厅门票，够在诸暨剧院看一场诸暨市越剧团演出的《西施断绢》。后来我离开县城，去住省城杭州编杂志、写小说，生活渐渐安稳。可安稳有时候像一层雾，让你看不清自己从哪儿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穿衣镜前，像时光穿越一般看见自己还站在县城的一条街上，年轻、懵懂、四下张望。那一刻我终于知道，我从未真正离开县城。

于是，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剧院》。写的是一个叫陈东村的警察和一个叫迟云的越剧演员的故事，他们一个想要从派出所回到刑警队工作，一个想要演艺事业登上新高度，这是他们的

执念。同时有执念的是，汤宝琴想要女儿出人头地，焦聪明想要好好经营照相馆，老裘想要发财后回到剧团工作……如此等等，无比琐碎却又又火辣新鲜。小说还写了一个由诸暨、嵊州和上虞这三个地方拼凑虚构而成的南风县，写1998年到2003年的5年间，写一个只有母亲和两个女儿的家庭，写一桩案件，写疼痛与挣扎。但我真正想写的，其实是那片土地上拥挤、嘈杂、鲜活的人间。2003年底，我辞职离开报社。此后5年中，我的生活不停变化，如同小说《剧院》中的5年，各色人等的命运也有着各样的反转。我其实热爱着县城的烟火气，觉得它比大城市多了些熟人社会的羁绊，同时也多了一层熟人社会的温情。

有人说，《剧院》不像典型的悬疑小说，更像是世情小说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我真正写下的不是类型，而是记忆。是那些在太平桥、人民路、横街、老庵山发生过，又随风飘散的生活，是我在县城留存下的所有声音、气味和温度。

每一次写县城的街巷、剧院、江水，我都像是在和过去那个穿着劳动皮鞋、略显困顿的青年对话，然后得到治愈。就像我在小说题记中写下的，我们都置身剧院，却难以看清剧情的

## 判断与热爱无法取代

赵 焯

这些年，我翻译的《乔布斯传》《我看见的世界》《纳瓦尔宝典》等图书受到读者欢迎。它们被选择和阅读，背后指向的，正是当下读者的精神需求。

在快速变化的时代，人们被技术浪潮不断推着向前，渴望理解世界运行的逻辑，寻找自身安放的位置。无论是对科技发展的思考，对个人成长的探寻，还是对复杂现实的系统性认知，这些都需要在阅读中获得回应。而翻译，正是让这些思想跨越语言和文化、与更多读者相遇的重要路径。

在自传《我看见的世界》开篇，人工智能领军人物、华裔科学家李飞飞讲述自己从一家酒店出发，参加一场攸关事业前景的活动。酒店大堂朴实无华，秩序井然，让人得以从容启程。我常想，其实每一部作品，都像一座精心建造的酒店。读者进入其中，短暂停下脚步，获得知识、思想与情感的滋养，整装再出发。

也正因此，我更愿意把翻译视作一种“文字筑境”的过程。在这场筑境之旅中，译者首先需要反复校准三重关系：一端连着作者，理解其思想来路、表达目的与文字底色；另一端通向读者，体察他们的阅读期待与理解习惯。译者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器，而是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搭建一座真正可通行的桥梁，这桥梁甚至成为风景的一部分。

着手翻译《我看见的世界》时，我不断追问自己：如果李飞飞用中文母语书写这本自传，她会如何讲述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，又会怎样回望自己的成长道路？我想，她的语言应当清晰克制，叙事深入浅出，既有科学家的理性，也不乏人文温度。这种基于作者背景与思想特质形成的整体判断，加上译者在长期阅读与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语言品味，构成了中文版译文的风格目标。

类似的判断，也贯穿于我翻译过的其他作品。《纳瓦尔宝典》《财富方程式》阅读人次超百万，正在于这两本书回应了大家对“创造财富、获得幸福”的现实关切；《乔布斯传》经久不衰，因为作者艾萨克森以极具张力的人物形象，呈现了创新精神与人格力量；而达利欧的《债务危机》、苏世民的《我的经验与教训》，则为读者理解复杂的经济与市场提供了结构化的思维工具。这些作品类型各异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：不仅有信息，还有被验证过的经验、可供思考的框架，最终提供了在变化的时代中安顿自我的坐标。因此，翻译的意义不只是“把书译出来”，而是要确保这些思想在进入中文语境时，既不失其锋芒，也能被真正理解。

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语言的转化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。当机器已经可以完成大规模、多语种的即时翻译时，人们不禁发问：在智能时代，翻译中究竟还有什么不可替代的？

在我看来，是判断与热爱。智能工具无疑强大，它不知疲倦，没有情绪，是出色的“选项提供者”。但最终的抉择，仍然必须由人来完成。这抉择的背后，是人类特有的情感与超越。人类会为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的灵感迸发而欣喜若狂，会为一个词的选择反复斟酌，会在完成任务后仍不断通读修改，为那些几乎无人察觉的细节付出心血。这种在局限中依然选择直面不足、承受痛苦、不断逼近极限的意志，显得尤为珍贵。

技术可以改变工具，却无法替代判断。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，翻译不仅是一项专业工作，更是一种文化责任。它让不同文明的思想在同一时代彼此照见，让世界的经验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新的生命。

当读者走进一部译作，感到阅读自然流畅、思想触手可及，仿佛一切本该如此，那正是“文字之境”得以成立的时刻。而对译者而言，最好的作品，永远是下一部。



本版邮箱：dushu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：张明瑟 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

《剧院》：海飞著；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走向。在社会这座大剧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时是演员，有时是观众。而县城，就是我最初登场的那座剧院。它教我哭笑，教我行走，也教我写下第一行字，第一部作品。

中国有千余座县城，曾有数千座县城影院，而生活在县城的，更是庞大的人群。我与县城，从身居其中，到后来远远观望。现在我家老家的村庄已经拆迁，在县城生活时的街道变了模样，影院也早已成了一家超市，连当年卖包子的“桃花源”也找不到了。可它们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完整。我怀念它的方式，就是不停地写它——写下它的气味、它的温度、它曾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悲欢。最终写下的，就是热气腾腾的《剧院》。

如果你也在某个县城生活过，离开过、又梦回过——那么在小说《剧院》里，也许和陈东村以及迟云一样，有你的一个座位。我们都在各自的剧场里，演过青春，也演过受伤；演过拥有，也演过离别。而所有的故事，最终当我们回望时，我们才真正拥有它。

## 论艺问道四十年

冯 巍

仲呈祥文艺评论集《文坛悟道：我与〈中国艺术报〉二十年》近日出版，与其《文苑问道：我与〈人民日报〉三十年》《艺坛追光：我与〈光明日报〉四十年》形成呼应。读这3本书，不禁为作者40年来的笔耕不辍和成果之丰而击节。

这40年，作者密切关注文艺各领域创作，提出了不少有益见解。他最早的一篇评论，是1980年3月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的《有句话说好 有句话说坏》。文章认为，彼时围绕小说、戏剧作品的讨论和“歌颂与暴露”、真实性、典型性等理论问题的争鸣是积极的，文艺评论应该实事求是，成为作者和读者的“诤友”。时隔不到两年，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《理想·道路·人生观——关于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重要问题》，列举当时小说中的各类青年形象，提出作家应该跟着生活前进，为读者找到奋勇前行的力量。后来，他关注的领域逐渐从文学拓展到影视、戏曲、戏剧等。2003年5月，他在《中国艺术报》发表了第一篇文章，直面历史题材电视剧热播引起的讨论，认为历史剧应在遵循电视艺术创作规律的同时，让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“是其所是、非其所非”。

这些文章所聚焦的话题，既是时代机遇使然，也从最初就锚定了作者为文的底色。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，作者始终置身文艺现场，坚持发声。他珍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，指出影视作品强化文化意识的可贵，洞察戏曲展演对调控文化生态的重要价值，倡导“文艺要化人养心”……翻阅这3本以时间为序的文艺评论集，会发现作者在40年的笔耕路上，致力于建构文艺评论的主体性，始终追求为文艺擦亮精神标识。

作者对文艺评论建设的持续思考，尤为值得关注。早在1980年发表的《漫谈作家与文学批评》一文中，作者就强调文艺评论端正态度之必要，认为透彻说理的文学批评，能够拔除作家头脑中的“莠草”，给予其营养，“锋利”其思想。进入21世纪，作者撰写了《文艺评论家要敢讲真话、敢抒真情、敢求真理》等不少文章，呼吁文艺评论成为创作的镜子和良药，扩大阵地、拓展渠道、整合资源、建设平台、提高影响力，等等。概言之，作者以评论穿透文艺的时光隧道，目的就是为文艺创作中蕴含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、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揭示出来，鼓励创作及评论一起滋养向真向善的社会风尚、时代风潮。

这3部文艺评论集的“立此存照”，既是仲呈祥个性鲜明的评论者肖像的呈现，也是文艺评论工作发展的侧写，使我们通过作者40年的论艺问道，一窥中国文艺从高原走向高峰的奋进之路。

（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研究员）



《文坛悟道：我与〈中国艺术报〉二十年》：仲呈祥著；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

## 新书上架



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百问》：本书编写组编著；人民出版社、海南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回应和解答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热点问题，帮助读者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策框架和发展方向。



《汉字看中国：字里行间的文明与生活》：孟德宏著；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。

本书将汉字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入口，解说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与思维方式。